

第一章 说名

第一节 浙江之得名

杭州属浙江省，又南濒浙江。故我说杭州，先说浙江。

浙江之得名有四说：

一说 浙江上流受婺、衢、歙三港之水。水出两山间，盘回百折，故曰浙。按：此为燕肃之说。但凡诸大水之上流，无不屈曲于群山之间。何以兹水独以浙名？理由似欠确。

一说 钱塘江口，浙山正居其中。潮水投山下，折而曲，故曰浙。所谓浙山，盖赭山也。按：此为虞喜、卢肇、祝穆诸人之说。然龛、赭二山间，古谓之海门，海潮至此反折。此特口门外一部分之事，即以名其上流之全体，似未必然。

一说 因其中一部曲折如“之”字，故曰浙江，且有称之为之江者。按：此说创自钱惟善。元代至元元年省试《罗刹江赋》，锁院三千人，独惟善据枚乘《七发》，辨钱塘江为曲江，与主试者意合，由是得名，自号曲江老人。于是众口一词，以浙江即为曲江矣。不知核其实际，乃大不然。浙江之名，春秋时已有之。而此“之”字三曲之形成，则宋以后之事也。宋以后始有此三曲形，而谓春秋时已预锡此嘉名，宁有此理耶？考今日钱江三曲之地，在富阳、杭县、萧山三县之间，以袁家浦一带之沙嘴尖锐向东伸展；又以钱江大桥南端萧山县之钱江站及鲇鱼嘴一带之沙地，弧形向西扩张，因而构成如此之三折形。但宋以前，江流之势并不如此。袁家浦之西有浮山，宋时尚在江中。浮山之西有定山，其先亦在江中。宋时尚突出江中数十丈，江涛至此辄抑，过此又雷吼霆奋，故以“定”名。苏轼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》奏议曰：“潮自海门东来，势若雷霆。而浮山峙于江中，与渔浦诸山犬牙错入，以乱潮水。洄洑激射，其怒自倍。沙碛转移，状如鬼神。往往于渊潭中涌出陵阜十余里。旦夕之间，又复失去。虽舟师泅人不能前知其深浅。”观此数语，则可知当时定山以东尖锐

之沙嘴，与渔浦以西弧形之沙地，两皆无有。渺渺荡荡，纯属江水。则所谓“之”字形者何自而来？所谓曲江者更何自而来？而浙江因此得名之说不攻而自破矣。

一说 江自太湖来，大势南流，绝钱塘江，复折而东，其形方折，故曰浙。所谓江，盖长江也。按：此说出于晋灼，而清代阮元宗之。其解“折”字最为明确。折者方折，与其他水流之弯曲者不同。惟谓水自太湖出，似未合理。地势南高北下，不能倒流也。且仅仅向东一折，亦不足以尽之。

然则其说应如何？曰：浙江者，古南江之下流，自今之皖南来，经长兴与安吉两县之间，过崇德县北，至嘉兴县境，折而西南，经杭州，至萧山，再折而东，以入海。其水不自太湖来也。凡自长兴、安吉以下之水道，皆名浙江，不仅限于杭州之一隅也。其水凡再折，不止一折也。其形如以太湖为一点，恰如“之”字。非如今所谓三折之“之”字形者，乃反书而非正书也。详其理由，宜考南江。

附 南江考

《书·禹贡·扬州》：“三江既入”；其下导水，曰“东为北江，入于海”；又曰“东为中江，入于海”。三江之名仅举其二，南江独缺如。然有北有中，则必有南可知。《周礼·职方》谓“东南曰扬州……其川三江”。殆即《禹贡》之三江。但未标其名，更未确指其地。后世遂有以吴淞江、娄江、东江为三江者，有以浙江、浦阳江、剡江为三江者。不特南江之名不彰，即三江亦纠纷而莫辨。《国语·越语下》，范蠡曰：“与我争三江、五湖之利者，非吴耶。”子胥曰：“吴之与越也……三江环之。”所谓三江，即《禹贡》之三江也。如以吴淞江、娄江、东江为三江，则与越无涉；如以浙江、浦阳江、剡江为三江，则与吴无涉，且不能称环。环者包围之意。北近长淮，南抵会稽，吴、越两国实处其中，则环之谓矣。三江吴得其北其中，越得其南，均不能全擅其利，故势有必争也。

考《水经》，沔水与江合彭蠡，又东至石城县，分为二。其一东北流，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。其一东至会稽余姚县入海。按汉之石城县，隋代改名秋浦。其故城在今安徽省贵池县之西。大江之水至此而分。其东北行者既称北江，则东至余姚入海者，虽未明言南江，而其为南江可知。酈道元注《经》，径名之曰南江，不为未见。北江在北，南江在南，其中所包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、杭、嘉、湖诸郡及皖南一部之地，皆为大江之冲积层，不啻一极广大之三角洲。子胥之所谓环者是也。又考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于丹阳郡石城县下注曰：“分水江首受江，东至余姚入海，过郡二，行千二百里。”其说与《水经》同。桑钦、班固皆汉人。吾国地志，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外，无古于此

者。两说既合，则南江下流之在浙省无疑矣。惟班《志》于吴县下，又注曰：“南江在南，东入海。”自有此说，后世考古者泥之，以为南江在吴县南，不信东至余姚入海者之亦为南江矣。夫在吴县南之南江，即今之吴淞江，以在县南而名之曰南。若东至余姚入海之南江，则别于北江、中江而名之曰南。二者名同而实有二水。岂得谓吴县下已有南江，北江、中江之外，不应更有南江也。

酈道元虽以分水江所出者为南江，而对于东至余姚入海之说则疑之。其言曰：“《经》书为北江则可，又言东至余姚则非。考其经流，知《经》之误也。”道元之意，盖以南江为入太湖也。故其下注之曰“江水自石城东入为贵口，东经石城县北”，“东合大溪”，“又东与贵长池水合”，“又东经宣城之临城县南，又东合泾水，南江又东与桐水合，又东经安吴县，号曰安吴溪，又东旋溪水注之”，“南江又东经宁国县南”，“又东经故鄣县南、安吉县北”，“东注于具区”。此注于南江之上源可谓明晰。以今日之地理言，即自皖省贵池县，东经青阳、南陵、宣城、广德，而至浙省之长兴、安吉诸县境也。但今日皖南地势，南高北下。其间山岭重叠，所有青弋江、水阳江诸大水皆北注长江。而谓当时南江之水于此横贯，疑于不可置信。然《水经》言之，班《志》载之，酈氏并历历详其所经之地，且详举其所受之水，度必非向壁虚造。当时地形必如此也。《左传·襄公三年》：“楚子重伐吴，为简之师，克鳩兹，至于衡山。”杜预注曰：“衡山在吴兴乌程县南。”夫吴楚战争，当时多在皖北。今乃深入浙境。是果由何道以至此？杜预精于左氏，其注必非率尔。其为泛南江而来无疑。此为南江东至乌程之确证。盖其时之南江，尚未注于具区也。

南江因乌程以下一段之湮塞，决而入具区，当系实况。然谓南江自昔即入具区，则大不然。不独班《志》、《水经》东至余姚入海之说历历俱在也，即以酈注言之，酈注于东至余姚入海之下，注曰：“作者述志，多言江水至山阴为浙江。今南江枝分历乌程县南通余杭县，则与浙江合。故阚骃《十三州志》曰：‘江水至会稽与浙江合’。”按酈氏所谓作者述志，除阚骃外，未举其名。不知所指何书？然既曰“多言”，则不止阚骃一人，可知众说僉同。且谓“南江枝分历乌程县南通余杭”，则南江之水明明至余杭矣。自余杭经钱塘再折，则至余姚矣。不信众说而反讥《经》之误，是何故耶？岂经文偶误，各家亦无不误耶？且所谓“枝分”者，分于何处？干流又何在？如谓分于故鄣、安吉之间，则的是干流，入具区者乃其横决之旁支。以庶夺嫡，而反讥《经》之误，此酈氏之失检也。

酈氏失检之原因，在泥于《山海经》“浙江出三天子都”一语，而误以渐水为即浙江也。故其注渐江水篇，第一句即曰：“《山海经》谓之浙江也。”夫既以渐水为浙江，则于其所采集之书，凡有云浙江者，均属之渐水之下。而其中乃有“浙江又东经御

儿乡”、“浙江又东径柴辟南”、“又径永兴县北”之语。夫御儿乡在今之崇德县境；柴辟在今之嘉兴县境；永兴即今之萧山县也。渐水如果系浙江，自桐庐、富阳来，即已至永兴县北，何必经御儿、柴辟后始至永兴县之北？且富阳至御儿亦万无相通之理。盖此三语者，为古代言浙江水道之书。即自乌程来，经御儿、柴辟一折而至永兴，再折而至余姚入海也。酈氏强割裂之，使属于渐水，于是颠倒错乱，不可究诘矣。然幸而留有此三语，而南江故道始可得而明；浙江之折始可得而见。否则《水经》、班《志》东至余姚入海之说，终古迷昧，而浙江之所以称浙亦无从知之。

以此三语观之，可知南江下流之称为浙江，在御儿以西已然，不独御儿以下也。春秋时，越之北境至于御儿。吴越争衡，实以此为重地。文种御吴之法，则曰“吾用御儿临之”。而吴王亦即于其近旁筑何城、晏城、萱城以为之防。其城皆在今之崇德县境也。以意度之，当皆在昔时南江之滨，亦即所谓浙江之滨，所谓争三江之利也。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中，恒有“战于浙江之上”、“勾践起师逆之江上”、“群臣送之浙江之上”、“勾践还至江上”等语。其所谓江，所谓浙江，殆即指御儿左右之浙江，不尽属之钱塘江也。《国语》谓勾践伐吴，用御儿人涉江袭吴胜之，可见御儿之濒浙江矣。假使当时浙江即为今之钱塘江，则何以用御儿人涉之？此又一证也。勾践惟有此浙江之利，凭恃其水师，自御儿溯浙江而西，可至今之长兴。故吴之夫概王筑长城以拒之。自御儿循浙江而东至柴辟，亦濒江重镇。故吴王亦筑携李城以御之。其后一战而败吴军，杀阖庐，即在于此。自御儿越乌程，战夫椒笠泽，则在太湖之中矣。当时吴越争衡之情形，大致如此。假使所谓江，所谓浙江，即指今之钱塘江而言，则越之北境，当以钱塘江为限，不得在御儿。而文种以御儿临之之说为大谬。且果以钱塘江为限，则所有战争应皆在钱塘江以北。何以远在御儿、柴辟之境？而吴人筑城防守，多至四五处，亦无一处在钱塘江之滨也？故以酈道元所引此三语证之，可知自御儿东西以至钱塘永兴，再至余姚，一折再折，其水均名浙江。而“浙”字之名，即取义于此。而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中之所谓江，所谓浙江，不尽指钱塘江而言也。

古者凡水皆有专名，不相假借。江河淮济，皆专名也。江水自江水，渐水自渐水，各为一水。故许氏《说文》于“浙”字下注曰：“江水东至会稽山阴为浙江。”于“渐”字下注曰：“水出丹阳黟南蛮中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亦于丹阳郡黟县下注曰：“浙江水出南蛮夷中。”渐水即是江水，至下流而异名。故许书不必更详其原。渐水别是一水，故许书必言其所自出。二者之辨，彰彰如此。酈氏素称博极群书，岂于许书独未研究耶？惟桑钦《水经》，不曰渐水，而曰渐江水。以一江字，此甚可怪。以意度之，《水经》所举，殆皆汉代通用之名，非其旧矣。如河本为黄河之专名，而《水

经》中乃有瓠子河一条，因汉武帝塞瓠子决口而受名。而武帝《秋风辞》亦有“泛楼船济汾河”之语。非河而谓之河，可知汉代已破其例矣。非河而谓之河，故非江亦谓之江。《水经》中渐江水、庐江水、斤江水、延江水之所由来也。况渐水下流本入南江。南江虽涸，而下流一部之称为浙江者尚在。渐水从而混合之。于是遂冒浙江之名，此为可能之事也。

《山海经》为夏禹、伯益所作，此说不可信。其书中有商汤、周文王葬所，又有余暨、彭泽、淮浦等汉县，其为汉人所撰托无疑。其言曰：“浙江出三天子都。”可知汉初渐水已冒浙江之名。而南江、御儿、柴辟一带之涸塞，必在战国之时矣。然桑钦汉人，班固、许慎且为后汉人。其言渐水，犹不与浙江混。伪撰《山海经》者，何以于此而独昧之？或谓五代以前，书多传写。亥豕鲁鱼，往往而有。浙、渐两字，形本相近，草书尤相近。《山海经》原文或本作渐江，传写作浙，亦未可知。酈道元之时去汉益远，渐水混称浙江由来已久，耳闻亦习。或其文明系渐江水，而以己意改为浙江，亦未可知耳。

《禹贡》三江之说，后世聚讼纷纭，然未有寻求南江之所在者。清代阮元始撰《南江图考》，其大旨谓南江自安徽池州府过宁国府，会太湖，又过吴江石门，出仁和县临平半山之西南，折而东，由余姚县北入海。夫南江由池州府过宁国府，此酈道元之说也。南江入太湖，亦道元之说也。惟道元谓南江至安吉之北，故鄣之南，始东注具区。阮氏之说，过宁国即入具区。其说不同，姑不具论。最可怪者，其会太湖过吴江之说。太湖之水，是否可倒灌而至仁和，此别一问题。吴江县在太湖东南，南江之水既入太湖，则已与太湖之水混合，何缘而知由吴江向南流之水仍为南江之水，而名曰南江也？大抵阮氏确信有南江，而专于酈道元《沔水篇》之注中求之，不于《渐水篇》之注中求之，以致有此错误。而其原因，在不知浙江即为南江，未尝研求浙江所以得名之故也。

第二节 杭州之得名

杭州本为秦之钱唐县。故我说杭州之得名，先说钱唐之得名。

钱唐之得名有三说：

一说 《淳祐志》释文云：唐者途也，所以取途达浙江者。其地有箎氏居之。箎，古钱字，因以为名。

一说 《汉书》、《晋书》地志皆曰：“武林山，武林水所出。”阚骃曰：“武林山出泉水，东入海。”所谓武林水，所谓泉水，即今灵隐南北两涧所合之水。秦时西湖，犹为

大海之一湾，受潮汐之冲击。居民筑唐以捍之，故曰泉唐。王莽改曰泉亭县，仅改其一字也。唐代避国讳，加土为塘，始作塘。

一说 防海大堤在县东一里。郡议曹华信，议立此塘以防海水。始开募，有能致一斛土者，与钱千。旬日之间，来者云集。塘未成而不复取，于是载土石者皆弃之去，塘因以成。故名钱塘。此说见《钱唐记》。刘宋时刘道真之说也。其所谓钱，则钱币之钱，非泉水之泉矣。又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引《钱唐记》曰：“县近海，为潮漂没。县诸豪姓敛钱雇人，犖土为塘，因以为名。”此则仍是钱币之钱，非泉水之泉，惟筑者非华信耳。

综上三说，《淳祐临安志》之说想必有所本，而疑于附会。华信及豪姓之说，似矣。然秦始皇立县，已名曰泉唐。华信系汉人，何得以后加前？自宜以第二说为是。盖濒江海之民，以土御水，是其常识。灵隐山下之有塘，可能之事，不必俟之华信等始有塘也。华信所筑之塘，亦不在灵隐山下，详于后章。

至于杭州之得名，则始于隋，而在余杭。

余杭为秦始皇所立之县。其得名有两说：

一说 夏禹八年，南巡至此，因名禹杭。杭者，方舟也。禹至此造舟以渡。越人思之，且传其制。后讹禹为余。

一说 禹由此渡会稽，舍其余杭于此，故名。

按以上两说，以后说为直捷。秦时作余杭县，不作禹杭，无所谓讹也。然杭之为舟，则两说皆同。

隋于余杭县置杭州。杭之名取之于县，而即以县为州治所在。后乃移州治于钱塘。唐以后，钱塘遂专杭州之名。

第二章 说陆地

西湖古与江海通。是说也，人多疑之。明代田汝成作《西湖游览志》，谓自灵隐山而南，重冈复岭，隔截江浒者十余里。何缘越度以入西湖？清代毛奇龄作《三诂三辨》一篇，力驳杭城昔时皆水之说。此皆不知地理者也。毛奇龄盛气凌人，似于“高岸为谷”、“深谷为陵”二语亦未尝研究，尤为可詫。夫西湖古时通海之地，不在杭城之西南，而在杭城之东北。就西南而言，固有山岭限之；就东北而言，则莽莽平原，直接海门。今之桑田，皆昔时之沧海也。更溯而上之，至于隆古，则岂特东北一隅全为沧海，即杭州全境亦悉在海中。无所谓陆，亦无所谓山。所有之山，皆浸没于大海之中，茫茫一片而已。宋周密著《癸辛杂识》，其论吴山之青衣泉也曰：“石壁间皆细字水波纹，不知何年降水至此？今之城中，皆当深入水底数十丈。”观此数语，则杭州沧海为陆之遗迹，六百年前已有人见及之矣。然以此例细推之，则岂特数十丈之吴山而已。资严山高三百九十公尺，较其旁之北高峰为高。而其山石间亦多有水迹波纹，与吴山之青衣泉石壁同。此非昔时浸没海中，何以有此。近人章鸿钊先生西湖成因说，谓就事实观察，当时海准，远在杭州平原以上。在葛岭及南高峰一带之山，其一侧之山腰中，常有充填之红土，及平行水痕，为当时江潮波及之证。据此专家之言，也与周密之观察同。又杭州诸山，著名之洞无虑数十，深者且莫测其底。此非鬼斧之所凿，亦非神工之所施，盖昔时浸在海中，受地下水之浸蚀而成者也。夫此巍巍高山，昔在海中，何缘而矗立于地面？吾国先民知其迹，谓之“深谷为陵”。近世学者明其理，以为地壳变动隆起之所致。特其隆起极渐极微，历年甚久，人寿苦短，不之觉耳。秦始皇之至杭州也，置钱唐县。其县治所在，据《吴地记》谓，粟山上有城，疑即古钱塘县因山为城之遗迹。粟山在北高峰西南，高三百五十一公尺。始皇置县其上，似太夔绝。然以西湖大佛头证之，则在二千年前，粟山之高度或尚不如今日。大佛头者，据陆羽《武林记》，谓相传为秦皇系缆石。以今日之地势观之，距水面甚远，岂有系缆之可能？而当日曾传系缆，此可谓陆地以渐隆起之一证。故述杭州陆地之成因，应分两期：一为山脉出水时期；一为泥沙淤积

而构成平原时期。山者，陆之骨；泥沙者，陆之肉也。

杭州之山，自天目山来，凡两支：一支自武康、余杭之界入境，为东西百亩山，所占不广；一支自余杭、富阳之界入境，磅礴郁积而东北，北抵宝石山，南极吴山，西傍西溪，环三面皆江海也。此外之太仆山、皋亭山、临平山、超山等，皆浮于海中之岛耳。故斯时之陆地，惟山与岛。既各因其高度逐渐出水，而其旁山麓所积之泥沙亦随之出水；加以江水海潮，又复不绝推送泥沙，增其高处，填其低处，而陆地成矣。杭州北部，古时有长江下游之南江，萦回曲折于其间。故其平原当亦为长江之冲积层。秦始皇东巡至嘉兴，改长水县为由拳县。又至海盐，登秦驻山以望海。再至杭州之临平，又经皋亭山之阡湖，而系缆于西湖之大佛头。可知临平、皋亭一带早已成陆，而通行无阻矣。

至于杭州西部，北有东西百亩山，南有武林山、黄山。其间深入于余杭县之东南部者，本为上古时之一大海湾。既因山脉之逐渐出水；又因超山、皋亭山之屏障其外，不受海潮之震荡；而苕溪又挟天目诸山之泥沙，不绝输送，平畴莽莽，此其所以成也。南漳湖者，在西溪之北。古时为一大湖，今名河渚。清代孙之騄居此，著《南漳子》一书。其言曰：“南漳湖当天目万山下流之冲，潴为巨泽，蛟蜃之所出没。逮东汉灵帝熹平元年，余杭令陈公浑开南上下两湖以蓄淫潦，捍之以横塘，泄之以斗门。水之来也，势缓而力分。南漳湖之受水亦益少。水渐杀，土渐出。伏而为滩，突而为洲，民乃得依之以居，河渚自此名焉。”由此言之，杭州西部平原之成，当在东汉以后。而同时太仆诸山之宛在水中者，至此亦四围皆平原，而连于陆地矣。

杭州北部，既因有超山、皋亭山、临平山而次第构成陆地，西部复因苕溪、南湖之浚治而长平原。其间成陆最迟者，为自嘉兴来至杭州，及自杭州至海之二段。盖即昔日南江之故道也。《南漳子》曰：“盖唐以前，自杭至嘉，皆悬流。其南，则水草沮洳，以达于海。故水则设闸以启闭，陆则设栈以通行。古胥山碑谓石栈自钱唐北抵御儿之口，乃其证也。”观此数语，则可知南江在柴辟以西之故道，虽已久涸，而自柴辟西南至杭州之故道，至六朝时犹涸而未尽。隋炀帝开运河，或即因其地势而为之耳。

至于由杭州而南，“水草沮洳，以达于海”之一段，则为南江最后之一段，亦即浙江最后之一折。清厉鹗《艮山杂志》曰：“自赭山约十余里为临平湖，又十余里为槎渚，又十余里为诏息湖，又十余里为泛洋湖，又十余里为缆船石，以上五处，在今犹为大泽，在古则联贯成一。”故西湖通海故道，不在南而在东北也。此数语，可为南江下流入海故道之明证，即所谓“水草沮洳，以达于海”之地也。赭山当南沙之极南。秦汉之时，南沙早已涌现。故班《志》、《水经》之言南江，皆曰至余姚入海，因必

须越过南沙，始入海也。假使其时尚无南沙，则过临平湖即已汪洋无际，不必至余姚之北矣。（南沙、赭山，夙分隶海宁、杭州。自清代北大甬开后，嘉庆间改隶萧山。）临平湖在汉时，时开时塞，至孙皓时又一开，至陈后帝时又一开。所谓开者，殆口决而又与江海通也。盖其时湖旁虽涌沙碛，而未甚固；潮汐偶汹涌，为所卷去，湖中之草亦随以去，故曰开也。今则距江甚远，水亦仅止一勺矣。槎涑或曰近皋亭山，然不详所在，或已湮塞。诏息湖即阼湖。秦始皇过此，诏百官暂息，故有此名，今亦不详所在。或谓即艮山门外东北之草荡，未知确否？泛洋湖昔时甚大，与城内之白洋湖为一湖。吴越筑罗城跨其上，遂分为二。泛洋之名，即可见昔时之通海矣。明正德间，居民于泛洋湖畔，掘得航海大船之遗蜕，其制古朴，尤为通海之证。今则城内之白洋池，仅存遗迹；城外之泛洋湖，类于城河。昔日所谓“水草沮洳”者，早已变为桑田，盖经千百年之变迁而逐渐以成者也。

杭州城市之北曰湖墅。旧名青莎镇，亦曰湖州市。《尔雅》曰“水中可居曰州”（作“洲”者，后起之字）。而墅者，田园村圃之名也。南江下流之濶，随处皆成大湖。斯地居其中。东北则有临平、诏息；东南则有泛洋；西南则有金牛（即西湖）；西北至余杭则有南漳湖。诸湖之中，陆地成焉，人民萃焉，故曰州市。市与墅，音同而义亦相近也。湖墅之地有江涨桥，宋时于此置江涨务，可知其地昔为江沙矣。江涨桥与北新桥之北，其近者地名三里洋，远者地名十二里洋（十二里洋，在塘栖镇西南，近洛山，今改作漾）。湖墅之地虽已长成，而去海洋犹不远也。湖墅之地何时长成？无可考。梁武帝之臣朱异者，钱唐人，家江涨桥。其后舍宅为寺曰众安寺，后改名化度。又江涨桥之北有崇善庙，相传系东晋时所建。则可知湖墅陆地之长成，至迟当在汉代。

至于城厢陆地之长成，当以西部为先，而以吴山为主。自吴山之西引而北，则有竹园山，在清波门内，亦曰勾山。今虽夷为民居，而犹较其旁之地为高。自吴山之东引而北，至清河坊之高银巷内，有灌肺岭，然宋时已存其名。再引而北，至保佑坊之保康巷内，则有狗儿山，宋时尚存，今已无迹。再引而北，至丰乐桥之南，则又有狗儿山（见《咸淳志》），今亦早不存。再引而北，至弼教坊，则有扁担岭，今名扁担弄，即以昔时之岭名。再引而北，至仙林桥之仙林寺内，则有仙林山，亦名狗儿山，今尚保存。再引而北，至钱塘门内，则有虎林山，一名祖山，今在祖山寺内。夫吴山之脉，在地中者，隐隐隆隆，时起时伏。故其地势较两旁为高，其成陆最早，而人民率先聚居之。因而于昔时江海之痕迹，尚能记忆，而以之为地名。如曰漾沙坑，在浅山之麓（今名管米山，元代尚著名），则竹园山、灌肺岭间之一小海湾也。曰洋坝头，则昔时筑坝御潮之所也（今之洋坝头以东，宋时名东文锦坊，俗称坝东巷。旧传

江潮至此，有坝限之）。曰官巷口，则昔之官涧口也。曰后洋街，为今之法院路。曰前洋街，为今之竹竿巷。曰后，曰前，犹能记昔时距洋之远近焉。曰涨沙弄（今作张纱，在灯心巷内），则昔时沙之所涨也。故窃谓隋代迁州城以后，人民之居平原者，以此一带之地最为稠密。即其城垣北部所包，亦仅限于此一带之地而已。

以唐李泌凿井之事证之。李泌凿井，为人民之苦斥卤也。然其所凿，一曰相国井，一曰西井。其水口并在相国寺前，今解放街井亭桥附近之地。一曰金井池，在西井西北。一曰方井，一曰白龟井。其水口并在玉莲堂北，约在今法院路以西之地。一曰小方井，水口在旧菩提寺前，今钱塘门之地。此六井者，历代所共称。然皆在此一带之地区，而盐桥大河以东无有焉。北隅一带，亦无有焉。此可见当时居民分布之状况，亦可见陆地长成之先后矣。不然，同一斥卤之地，当同为居民所苦。李泌凿井，何以有所偏颇？岂此外居民不苦斥卤耶？因其不在城中，人口稀疏，故略之耳。（薛衙前有井，相传亦李泌所凿。其地有唐侯庙，祀李泌。此则在盐桥大河之东者。然为后人附会之词，不足为信。说详第五章杭州之水篇。古代所载李泌刺杭，止凿六井而已。）

吴山古名青山，以上有伍子胥庙，亦名胥山。俗名晾网山，以渔人晾网于此得名。渔人捕鱼于江，而晾网于此，此为濒江之一证。隋代筑城，此山并未包罗在内。唐代是否已在城内，无可考。然观李绅之诗曰：“伍相庙前多白浪。”又徐凝《杭州祝涛头》诗曰：“寄言飞白雪，休去打青山。”二人皆唐中叶以后人，而其诗所云如此，可见其时吴山之麓，犹为江水之所及矣。又赞宁《传》载，略谓钱武肃时，江西钟匡范献通天犀带，武肃命于碧波亭试之，与许彦方击楫而行，水开七尺许，还至瑞石山上岸。夫瑞石山即今之紫阳山。江中试犀，而上岸处乃在紫阳山。其为山之濒江无疑。碧波亭者，钱王阅武之所。据宋苏轼开茅山河奏议，谓其亭在洲前。北宋时之洲前，在今之嵇接骨桥，宋时即名州桥，去紫阳山甚近，故可于此上岸。由此言之，则今之嵇接骨桥东南，在吴越时犹为江海。而其成陆，当在钱武肃射潮筑塘以后。

江干地名见于历史之最早者，曰柳浦，曰黄山浦，曰定山，曰渔浦，曰同浦。《宋书·孔凯传》，吴喜兵至钱塘，进军柳浦，遣镇北参军沈思仁、强弩将军任农夫等率军向黄山浦。“东军据岸结砦。农夫等破之，乘风举帆，直趣定山”，斩其大帅，“自定山进向渔浦”。喜又使镇东中兵参军“刘亮由盐官海渡，直指同浦”；武卫将军“寿寂之济自渔浦，斜趣永兴。喜自柳浦渡，趣西陵”。此五地者，惟同浦今无可考。《神州古史考》泛言在江滨，而未能确指所在。然其文曰“直指同浦”，则或在江之对岸，而不在钱塘，亦未可知也。渔浦之地，晏殊《舆地志》以为在杭州西南。五代时，钱鏐拒刘汉宏，水军由渔浦出，则其地又在富阳东南。而萧山县亦有渔浦，与杭州

之六和塔相对。故《定乡小志》以为渔浦之地，三邑共之，东西约三十里，南北约二十余里。当日进军之地，果在何处？不可知也。定山当时犹在江中，故须乘风举帆。黄山浦在黄山之麓。明季江元祚筑室其山上，曰横山草堂，误黄为横。刘宋时江水犹及其麓，故有黄山浦之名。至于柳浦，则在龙山之麓。隋代迁州城，即在此浦之西依山筑城。或以为在今日之跨浦桥者，殆非也。《神州古史考》之说曰：自浙江至钱塘，有一山沿江而出，则有一浦循山而入。故凡浦必与山相近。水在山间，则为溪；出至山口，即为浦。今之跨浦桥，去山甚远。安得即以为柳浦之所在？

再以罗刹石证之。钱塘江中，昔时有罗刹石，矗立江心，大为舟楫患。行旅畏之，故加以罗刹之名（译言疾速鬼也）。而江亦因名罗刹。考《越绝书》，汉天汉五年四月，钱塘浙江中岑石不见。至七年，岑石重见。岑石之长一丈四尺，南北广六尺，东西广尺六寸。按：汉武帝天汉年号止有三年，并无五年，更无七年。其时间舛错如此，殊不可解。然石之长广，记之历历，似非伪造者。忽隐忽现，殆以沙之坍塌故。是否即此罗刹石，不可知也。清《杭州府志》载康熙十九年四月望日，岑石复见。此尤不可解。相去二千年，何从而知此所见之石即为汉代之岑石？即谓因其长广相合之故，然见于何地既不详，何时又复不见，亦不书。其时文人如林，亦未闻有歌咏之者，殆未可信也。罗刹石之所在，《咸淳志》谓在秦望山东南。《西湖梦寻》则谓在凤山门外之梵天寺前。二说不同。然秦望山所在，固有两说。一说谓钱武肃筑罗城，自秦望山起置门曰龙山，在六和塔西。则九龙头中之二龙头山是也。一说见晏殊《舆地志》，谓山有巨石二十余列，自然成行。则以今之将台山为秦望山。晏殊，宋人。《咸淳志》作于南宋，可知宋代固以将台山为秦望山。如此则与在梵天寺前之说无所不同。梵天寺固即在将台山东南也。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谓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，钱王张弓弩，候潮至而射之，由是水渐退，罗刹石化为陆地。夫罗刹石在梵天寺前而受潮头之直打，则今之凤山门内外，当时犹为洪波之所浸灌无疑。而今之跨浦桥地方，何以能有柳浦之存在？故隋代迁城柳浦，必在龙山之麓。所谓柳浦，或即后之进龙浦，未可知也。罗刹石在唐末，已改名镇江石。射潮之后，虽化为陆地，而其石仍在。《淳祐志》谓每岁仲秋既望，必迎潮设祭，乐工鼓舞其上。则石在南宋时犹存。今则无能指其迹者。是否与包山附而为一，不可知也。

自龙山循江而西南，南有昱山、石龙山，北有午潮山、黄山、大慈山，在古时为一海湾。其间之定山、前山、象山、庙山、浮山等，皆岛也。至宋时，定山已连陆地，而南半犹突出于江心。其东之浮山，则仍在洪涛中，而为行旅所惮。今则悉在陆地，名曰泗乡，沃野弥望。其长成盖在南宋以后，而与江潮有关。南宋之前，江潮由南大壑来，其扑杭州，系一直线，故势盛而力劲。杭城东南之地，实受其冲。尔时观潮

者，可登山而望之。潮之余势直达富春江以上。故定山、浮山受潮最烈。而神出鬼没之情形，有如苏轼奏议所云也（见第一章）。自南宋而后，潮势改由北大盩，其至杭州，成一大弯曲，故势缓而力减。杭州江岸受潮患渐少，而潮亦遂无可观。定山、浮山等之涨连于陆地，当在其时。即袁家浦一带之沙地尖锐向东突出，造成江流三折之形状，亦必在此时。盖怒涛之冲击力既不及此，一任江水之自上而下，自易造成此种曲折之形状也。

隋代筑城，因山凿磴。除吴山一部，前志谓其不在城内外，其他范围所及不可知。然北部平原之地，北至钱塘门，西薄西湖，亦可想象而得。至其东城，当在盐桥大河以西。《淳祐志》载吴越城门，有盐桥门及炭桥新门二门。此当是隋唐之旧。证以李泌凿井之事，其范围亦相合也。自隋筑此城之后，历一百年，至唐武后景龙四年，沙岸北涨，地渐平坦，桑麻植焉。州司马李珣始开沙河（一说系宋璟），此为东城开辟之始。又阅一百六十年，至懿宗咸通二年，潮水冲决，奔逸入城。刺史崔彦曾开外沙、中沙、里沙三河以决之。志书所载，且谓近南有坝头，遗迹犹存。然杭州《龙兴寺图说》及施宿《苏诗注》，均谓三沙河系景龙时李珣所开。或者崔彦曾因潮水奔逸，三河尽污，复开浚之，非所创开也。然此三沙河之地究安在？《艮山杂志》谓里沙河即后沙河。《咸淳志》曰后沙河在艮山门外坝子桥北。《嘉靖志》亦谓后沙河南接城内运河，北达蔡官人塘河。据此而言，则所谓里沙河者，即今之菜市桥河也。夫里、中、外之名，当以城市为主体，由城市而及江岸。不应以江岸为主体，由江岸而及城市。果使里沙河即今之菜市桥河，则所谓中沙河、外沙河者又安在？昔时望江门内有草桥，清泰门内有螺蛳桥，其下皆通舟楫。假定其即为中沙河，然外沙河又安在？今之城河，宋时犹是江，不能指为唐初之外沙河也。北宋时，沙河两岸，居民甚稠，碧瓦红檐，歌管不绝。士大夫多于此征逐。故苏东坡有“云烟湖寺家家境，灯火沙河夜夜春”之句。其时城垣，承吴越罗城之旧，东至今之城头巷而止，菜市桥河犹在城外。如此沙河即为菜市桥河，则其灯火繁盛，东坡何从而见之？且东坡请开茅山河状，谓茅山河两岸，居民无多，村落相望。夫茅山河在城中，距盐桥河不远，当时荒凉之状如此。而谓更在其东城外之菜市桥河，其繁盛反胜于城中，似无此理也。

按《艮山杂志》历引苏东坡诗词，以为东坡所谓沙河，即菜市桥河。此则谬误。其一，苏词：“沙河塘上插花回，醉倒不觉吴儿哈。”自注云：“钱塘吉祥寺花为第一。壬子清明，赏会最盛。夜归沙河塘上，观者如山。尔后无复继也。”按：吉祥寺在安国坊，今之军督司巷中。赏花夜归，盐桥河是所必经，决无再出城至菜市桥河之理。此谬误一也。其二，《望海楼晚景》云：“沙河灯火照山红，歌鼓喧呼笑语中。为问少

年心事在，角巾欹侧鬓如蓬。”按：宋时州治在凤凰山，望海楼即在山上。盐桥河之灯火，楼上可以望见之。若菜市河则有城闾之隔，何以能见？此谬误二也。其三，《湖上夜归》诗：“入城定何时，宾客半在亡。睡眠忽惊矍，繁灯闹河塘。市人拍手笑，状如失林獐。”罗良注：“河塘，沙河塘也。”按：湖上夜归，归州治也。盐桥河塘两岸之繁灯，当然见之。菜市桥河两岸，即有繁灯，岂得见耶？此谬误三也。故此所引三诗，不惟不能为沙河即菜市桥河之证，适皆可为沙河即盐桥河之证。惜不能起晴江老人而商榷之。

窃谓唐李珣所开之三沙河：外沙河当即菜市桥河，中沙河当即已塞之茅山河，里沙河即盐桥河。如此即里、中、外三字之名称方合。且盐桥河自吴越筑罗城包于城中之后，为交通运输所资。经二百年之生聚经营，其沿岸之灯火万家，自无待言。而洋坝头之名，至今尚在，与志书所载近南有坝头遗迹者亦合。故以盐桥河为里沙河，似无可疑也。至于菜市桥河，《咸淳志》谓之后沙河者，亦以城市为主体。近城市者谓之后，远城市者谓之前。南宋初，红亭沙涨，江岸益向东扩。草桥、螺蛳桥下之河，殆即新开之沙河，而因以菜市桥河为后沙河耳。

北宋时，杭城中繁盛之地，惟在盐桥之沙河一带，而其他皆不及焉。茅山河自今之贡院东桥南上，经五老巷、乌龙巷、高桥巷以至梅花碑，固与盐桥河并行，而又相距甚近者也。然苏轼请开河状，谓茅山河在人户稀少村落相伴之中，则其荒凉之情形可想。周辉祖者，南宋时人也。居后洋街，第宅毁于陈通之乱。其言曰：“闻诸故老，昔岁风物，与今不同。四隅皆空回，人迹不到。宝莲山、吴山、万松岭，林木茂密，何尝有人居？城中僧寺甚多，楼殿相望。出涌金门，望九里松极巨，更无障碍。自六飞驻蹕，日益繁盛。湖上屋宇连接，不减城中。”“一色楼台三十里，不知何处觅孤山。”杭州之成为天堂，自南宋始。

钱武肃王之射潮筑塘也，立铁幢以为测水之标准。其立幢之地，据元代杨维禎所考，有三处：一在旧便门街小巷中，今候潮门外之箭道巷；一在候潮门外利津桥北；一在旧荐桥门外，今城内章家桥之地。据《武林坊巷志》谓，箭道巷内有铁幢，宋时赵与簋曾筑亭其上，以为纪念。夫钱王立幢测水以筑塘，幢之所在当去塘不远。则自候潮门外，经箭道巷，以至清泰门内，皆为塘之所在，而其东皆江水矣。又宋仁宗时，张夏筑石塘，自六和塔以下凡十余里。杭人德之，立祠堤上，曰张老相公祠。祠在羊市街之关王阁，清时犹存。民国后建马路，乃废之。夫当日之堤既在此，则堤以外去江当不远。此与钱王立幢之处可互证也。北宋时有红亭税务，在今望江门内之红庙儿前。至宋高宗绍兴间，红亭沙壅。此亦可为昔时地尚滨江之一证。又宋高宗之来杭也，居归德寺。中夜闻潮声，以为金人之兵至，疑且惧。既知其非，

乃改寺名曰潮鸣。今则寺尚在，而去江甚远，决不能闻潮声。故今日东城外一带之陆地，皆为宋以后所长成，去江殆数十里矣。惟候潮门之处有楞木营，为昔时钱王堆置楞木之地，至今去江犹近。千余年来，似无所变更也。

沧海之成为陆地也，水不遽涸，必遗留为多数之湖泊。杭城陆地，虽长成已千数百年，而湖泊之遗留者，犹不少，不仅北隅白洋池、泛洋湖之大也。在北宋时，城西有俞家园，在今井亭桥西南，皆荒地污亩，菱稻杂植，行潦所归。当时有“俞家园，一夜雨，好撑船”之谚。乃建红莲花、白莲花二桥于上，以便行人。使非为大湖之遗迹，何以有此？至南宋时始填为平地焉。南宋时，富景园中有百花池，在今板儿巷，亦因湖泊而为之。清初尚有遗迹，今不可考矣。又有仁和龙池，在今池塘巷之北，清代名曰赛西湖。百年以前面积虽缩小，尚有一泓之水，今则仅存其名而已。此外如在今城站之金家荡，在蕙兰中学中之娘娘荡，在王马巷南之摇鼓荡，随时湮没者，正不知凡几。惟庆春门至艮山门一带沿城之地，号称东园者，昔时云有七十二荡，宋时此地弥望皆菜圃而倚之以灌溉者，今尚有多数之存在。出二门而北而东，湖荡亦不少。盖杭城陆地之成，以东北为最后矣。

此外尚有助长陆地之成者，曰尘土与污物之堆积，日增月累，至可惊人。余戚高氏，筑室竹竿巷，浚池掘地约丈许，乃有地平砖，排列整齐，盖昔人之居宅也。又民国初，宝石山畔有毁掘坟墓者，初为近人之墓，其下乃有宋人之墓，再下乃有晋人之墓，千百年间堆积如此。此则自上而下，与陆地隆起之自下而上者不同。考察古史者，掘地愈深，得物愈古，其以此夫。

唐李泌凿六井，为民苦斥卤也。北宋仁宗时，沈文通守杭，复引西湖水为南井。哲宗时，苏轼守杭，六井、南井并加浚治，复引其余波至威果、雄武二营之间，创为二井（在今通江桥北）。可见其时斥卤未尽去，犹有赖于湖水也。南宋时，六井、南井仍有修治。然至今日，城内外之井不可以数计。深至丈许，亦不苦其咸。近四十年来，西洋钻井之法行。杭人有效之者，如工学院，如安定学堂，如青年会，如兴业银行，皆尝试之。然至数丈之后，水反咸恶不可用，且有朽木败物杂其中。可见今日之地势，较唐宋时已高厚不少矣。此种高厚之原因，由于杂物堆积。而陆地隆起，或亦兼有之。

第三章 说山

杭州之山分两派：一派自天目山来，所谓“龙飞凤舞到钱塘”者是也；一派本为海岛，以沙涨而在陆地。

甲 自天目山来者

又分四支：

(一)来自富阳，又分为二：

一自富阳之如意尖入境，曰野山，西北临白沙坞，而西界富阳，盘亘甚广。其中之茱萸尖，高五百七十二公尺，险峻不可名状，为杭州最高之山。其石微赤，盖以色得名。或曰以产茱萸也。尖下为金子陇（亦作金子弄），以金姓族居得名，为白沙坞东界。其他皆陇阜错连，形家谓之懒坦牛皮涨。山为棚民翻刷殆遍，濯濯然童而疥矣。西北有山曰凤凰，尽于白沙坞中。次于茱萸尖者曰天宫山，尖峰挺立，上际云霄，亦以高著。

野山东北曰大湖山，以近湖步得名。湖步东南，平原弥望，直抵钱江。昔时殆曾壅塞而潴为湖，故有湖之名，今则无矣。亦名大和山。山顶平广，可五六十亩，有曲径可上。路口有双石，壁立如门，广仅容马。一夫当关，万人莫入，为险隘处。入石门以后，则土地平旷，竹树阴翳，仿佛古桃源。四围峭壁耸翠，形如削成，莫可梯缘。明末山寇柴日乾曾结砦其中。有洞曰钱王，亦名前山，又作泉山。洞门二，皆丈许，中广二三亩，不见日。泉乳所结，有长一二丈者。《钱唐志》谓纡回二十余洞，底有小窟，窟下大潭，深不可测。取石投之，声如洪钟。《康熙县志》则谓仅有七洞耳。《定乡小志》曰：山口第一洞，纵横广三四丈，高丈余，穹窿如盖，石乳下垂。第二洞，伛偻而进，高广倍之。第三、四洞，非卧行不能入。洞内有石床、石几、石斧、石鼎、石画匣，相传昔仙人炼形于此。最后一洞，有潭甚深，苍黝澄澈，不可逼视。潭岸石径，仅寸许，不能容趾，游者心悸。此洞仿佛若有光。余洞皆昏晦，必燃火始可。此洞近云泉山，故有泉山洞之称。

云泉山与大湖山相连属，一名西山。在湖口而近杨村，高耸奇秀，上入云际。山半有洞，曰风洞。洞顶，立夏后则清风自生，立秋后则止，故有此名。中有小石，红点如丹，持出则隐，置于内复如故，理不可晓也。石窍甚窄，其旁大石壁立，有宋人篆书“云泉灵洞”四大字镌焉。字分两行，行两字，字径丈许，书法迥古雄健，伟然巨观。石壁挺立前仆，可以避风雨之虐、苔藓之侵，故至今犹完好。其他宋人题名者，有祖无择、周之祥两处，亦无剥蚀。山下又有水洞，在慈严寺右，深广五六丈，嵌空玲珑，石乳倒悬，洞口下垂，如重帘半卷。洞内高邃明豁，有石乳结成僧伽象者，背石面水，左首右趺，宛然琢画。洞北石壁有罅，水之所出，可容一人。深黑莫测，人不敢入。水清见底，绿净如空。以手探之，始惊及腕。水纹圆晕，方知波动。终古涓涓，不见其流。入溪乃闻泉声。冬日有气如釜上蒸，暖同温泉；夏则清冷彻骨，偶一洗濯，泠然汗止。水源自大湖山来，有人以浮物验之，良确，故大旱不涸。洞外唐宋人摩崖题名十余处。虽石藓蚀，字犹可辨。盖唐宋时，江沙未涨，波涛淼漫。士大夫惮于渡江，多山行，故留题者多也，今则几无人知之矣。二洞亦合称风水洞。又以山中有寺名恩德，亦称恩德洞。山下有鲍家岭，居民以凿石烧灰为业。东尽于下杨村之平原。

茱萸尖东南曰万丈山。山形险绝，至者却步。再东南曰道士山，曰神山。神山西曰长岭，西通富阳。山之东曰石岭，峻极，人不易登。南曰塘山，曰笔架山，曰印山。印山以溪水回绕，形若浮印而名，其西亦通富阳。印山之东曰罗带山，群峰环列，缥缈若罗带，故名。旁为翠屏山。其东南曰朱家山，高三百有五公尺，西与富阳共之，东尽于上杨村之平原。其东南曰麻车山，南尽于社井。

朱家山之南曰牛眠山，曰圣帝山，高三百公尺。再东南曰龟山，曰葡萄山，曰狮子山，曰新岭，均与富阳共之，抵江而止。新岭一名界岭，俗名算账岭。其实平坦，非岭也。

圣帝山之东曰石和尚山，石峰矗立，如龙脊鳞鬣。有石如人，竦立山巅，远近望之皆奇肖，故名。旁有燕子山，亦以形似名。再东曰社井山，上有龙池，下为社井坞，北与麻车山遥对，而尽于社井之平原。

二自富阳之灵山北迤，曰板照山，在两县界上，高四百九十公尺。东南入杭境，分为三。一支南走，曰土母山，高二百五十八公尺，南尽于庄头，而与富阳共之。一支北走，曰青山，高三百公尺，上有青山庙，南与土母山遥望。东南曰北斗山，尽于白沙坞中之施家园。一支东北走，曰赤子坞山，高四百九十公尺，南与青山相望。其北曰前山，在祝坞里之东，高一百有七公尺。赤子坞山东逾分金岭，而与钱湖山相接。分金岭者，钱江与西溪之分水岭也，长十五里，平坦如路，南达施家园，北抵

余杭。其水分两派。一东南流，过桑柳坂（即眠牛山）入钱塘江。一西北流，折东北，绕钱家山之阴，而至闲林埠为西溪。

（二）来自富阳、余杭界上，曰石瑯山，高三百有七公尺。南沿杭富之界曰贤爱山，高一百九十公尺。再南曰玉皇山，高一百八十公尺。再南接于板照山。自石瑯山东北行，曰大朗山，高二百四十七公尺，有大朗慈社在焉。大朗山东南曰后山。再东南逾祝坞，而与前山相接。前后之名，以此而分也。

大朗山东行，曰狮子山，在杭、余两县界上，高一百二十五公尺。再东曰钱家山，高三百八十二公尺。其旁有九里暗山。分金岭之水，绕山而直达西溪。其西曰万罗山，群峰环回如罗，故名。北曰狮象山，为广福寺之护山。又有石膏山，出石膏若雪，故名，一名嵇留山。又有石老婆山，以形似名。钱家山东南曰东翻山，高四百七十六公尺。其西南曰泉湖山，越分金岭而与赤子坞山相接。南曰朱文山，高二百二十八公尺，尽于施家园之平原。东翻山之东曰大纛岭，岭西南通施家园，东北连于龙门岭，而达龙门山。岭东曰大纛山，高五百六十八公尺。其东北曰牛山，高四百十四公尺，尽树木桥之平原。大纛山迤迤而西南，曰四壁山，亦作石壁，西隔施家园，与北斗山相望，而尽于白沙坞。

白沙坞四围，高峰削翠，乱山巉岩，浓青不断，环若桃源。中间平旷，方数十里，有水竹田庐之胜，西南连于富阳。坞之东西，山岭甚多。在坞西者，曰大羊山，高峻与茱萸尖齐。山背属富阳，曰西坞山，曰龟山，曰蛇山，曰水孔山，曰沙岭，曰天姥岭，曰寒洞山，曰高阮岭。以其界于富阳，亦名交界岭。皆赤子坞山、青山、土母山之余脉也。在坞东者，曰青山（与前同名），低小而秀润，苍翠可挹。曰谈经台山，尖峰耸峭，高不可上。相传昔有仙人谈经其上，故名，下为谈经坞。曰板壁山，曰万宝石山，曰鹞鹅岭，今名桃红岭，在旋网山与牌山之间，东通金家岭，西出东坞山，而通施家园。东坞山中，别为一坞，庐舍竹木，环宅山麓。皆旋网山、牌山等之余脉也。白沙坞中，小山亦多。曰墨女山，近祝家村。曰红泥山，近富阳。曰乌龟山，近土木山。殆皆昔时之小岛耳。

大纛山南走，曰旋网山，亦作全网，高四百二十四公尺。东为黄梅坞，西为白沙坞。黄梅坞在黄梅山下，山麓绵邈，径二十里，溪水环集，多植竹，土人取以为纸，俗呼黄梅十八坞，自戴家坞而入皆是。旧时出税，皆由定南诸里居民散纳。故每当冬日，濒江村民，千百入坞，樵采弗禁焉。旋网山东尽于戴家坞，即白沙坞东畔也。

大纛山东南走，曰白岩山，高四百五十三公尺。危崖壁立，峻绝莫攀，樵父羸童，罕抄其径，脱巾仰睇，欲堕瑶簪，但见苍岚白云冠覆峰顶而已。顶有天池，大旱不竭，时有云气升焉。山中有尊圣寺。寺前有峰，不甚高而圆净如珠，名曰珠峰。